

田野政治学的拓展：基于数字空间的视角

王承禹 刘 骁

摘要 田野政治学基于对村庄的大型深度调研，为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作出诸多有益尝试。数字空间引致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治理界面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成为田野政治学新的田野场域。田野场域的迭代对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的拓展创造了契机，提出了要求。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可以引入网络民族志、数字田野实验等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适配；基于数字空间中的经验变迁，实现农民性、家户制等经典概念的再造；捕捉数字空间中的新兴现象，实现田野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更新。

关键词 田野政治学 自主知识体系 数字空间 乡村治理

作者王承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杭州 311121），四川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4）；刘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2-0090-10

政治学从问世以来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路径，二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路径。^① 中国政治学重建初期，较多学者采用规范的方法，钟情于研究前者。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一些学者有意识地从殿堂走向田野，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对基层政治尤其是农村政治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秉持这一研究旨向的政治学者倡导以田野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他们通过持续和深度的田野调查，并力图从中提炼理论，进行原创性研究，由此形成田野政治学派。^②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起步较晚，长期处于向外国学习的阶段。在跟跑过程中，因缺乏从事实出发的实证研究以及尚未形成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中国大量丰富生动的政治事实为既有的理论所遮蔽，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尚未形成自己的学术自主性。以徐勇为代表的田野政治学派主张以实证调查为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场域的经验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生产。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创制出区别于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为个体活动提供新的场景。机器智能已然或正在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社会的运行方式与制度的运作逻辑。^③ 在此过程中，田野的边界与形态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微信、抖音等数字平台改变了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与互动方式，在乡村社会建构出一个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不仅是现实田野的延伸，更是一种具有自主结构与互动逻辑的新型“田野”。在此背景下考察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① 徐勇：《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政治科学研究》2018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

② 徐勇、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③ 邱泽奇：《人机社会的治理转向》，《社会》2025年第3期。

一、田野政治学：田野与政治学的交汇

田野是来自西方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在语义上，“田野”同时关联 ethnography 与 fieldwork，在一定程度上，“田野”（fieldwork）对应的是“民族志”（ethnography）中的实践行为层面。^① 在实践上，民族志研究体现为“进入特定社区运用参与性观察或访谈来了解社会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对民族和群体进行的直接研究”^②。自“马林诺夫斯基革命”^③以来，“参与观察”构成田野工作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通常指研究者进入某一场域，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地参与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④ 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和可靠性，通过参与观察，研究者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其他调查方法所不及的。^⑤ 田野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体系，更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有学者指出：“‘田野’首先是空间和物理层面的。从人类学起源之初，田野就意味着‘他者’的文化所在地。”^⑥ 对此，费孝通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⑦ 在一定程度上，“学科成果要获得实证，必不可少的就是在实证场所中获得证明，这种实证场所就是学科田野”^⑧。总体而言，“田野”既是民族志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场域，是指研究者深入实际社会生活现场，通过田野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研究对象真实生活的空间，是社会关系运作的场所。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治国理政的学科，其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国家导向。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议题多集中于国家政治、国家制度，政治学被奉为“庙堂上的学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政治学逐渐从殿堂走向田野。人民公社解体后，广大农村社会需要新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作为农村社会新型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应运而生。村民自治不仅是基层政权治理的新形式，也与自下而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关联。因而，村民自治不仅是一种现实需要，更是一种价值关怀。村民自治甫一问世便受到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并一度跃升为显学。此外，政治学者因为外部形势的变化顺势将研究重心从国家政治的宏观层面转向基层政治的微观层面，即“学术重心下沉”^⑨。以张厚安、徐勇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学者开始对农村基层政治展现了强烈关怀，并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学研究也由此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学者深刻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学科意识。为加强对田野的学理性研究，徐勇于2008年发表《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一文，首次提出了“田野政治”这一概念，并就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加强田野政治研究作了系统的阐述。以此为标志，田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派逐渐发展起来，田野政治学研究也从狭义的田野政治转向广义的田野政治。在田野政治学视域下，田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农村；二是调查。田野政治学起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⑩

田野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实践的产儿，也是学术反思的产物。田野政治学强调深入一线获取扎实的经验材料，通过“由下而上”的路径理解中国政治过程，在“经验—概念—理论”的链条中逐步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与分析工具，回应中国政治的独特现实与问题导向。有学者指出，田野政治学尝试建立一个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从中国农村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政治。^⑪ 进一步而言，田野政治学强调“用中国

① 李菲、邱硕：《“田野”的再概念化：兼论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同一性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上），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281页。

③ 王立杰：《用“田野性”认识人类学田野调查》，《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⑤ 郑欣：《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实证方法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⑥ 孙信茹：《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媒介人类学的视角》，《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

⑦ 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

⑧ 罗康隆、刘锋、吴合显：《田野调查十二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11页。

⑨ 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4日。

⑩ 徐勇、漆程成：《在“殿堂”与“田野”之间——构建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⑪ 郭忠华：《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三种进路——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建构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并尝试与西方政治理论进行对话。^①在一定程度上，田野政治学代表着中国政治学学者为构建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努力。

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政治学，田野调查是田野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并在长期研究中获得政治学田野学派自觉。”^②田野政治学派的田野调查传统可追溯至 1980 年代。从那时起，田野政治学派便根据承担的涉农项目开展田野调查，并于 1997 年出版“村治书系”。2006 年，田野政治学派启动“百村观察”计划，对全国 300 余个村庄 5000 余个农户进行长期定点跟踪调查。2015 年，田野政治学派启动“深度中国调查”，从口述史调查、农户调查、村庄调查、专题调查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开展深入调查。在深入调查过程中，田野政治学按照村庄分化与整合的程度，将中国农村分为 7 大区域性村庄展开调查研究。^③在开展大型深度调查的同时，田野政治学派也注重开展历史比较的调查翻译。田野政治学派先后组织开展日本满铁农村调查、俄国农村调查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满铁农村调查》《俄国农村调查》等历史调查资料。在此意义上，田野政治学所开展的田野调查既延续历史，又立足当下，还面向未来，形成了由基础性调查、学理性调查、区域性调查、系统性调查、主体性调查、传承性调查、比较性调查等构成的综合调查体系。^④

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理论建构基础的政治学。田野政治学注重小田野中的大理论，即对田野政治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调查，发现其背后的内在机理，并将田野的发现理论化，形成具有理论性的命题，以此回应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国家作为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构成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关怀。田野政治学通过对 20 世纪以来国家的各种下乡活动和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行动进行概括，提出了“国家化”^⑤这一概念。在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国家化”从多个维度与不同原创性概念建立联系，构成田野政治学的枢纽概念。^⑥具体而言，“国家化”的概念建构呈现出由具体的人到农户，经由村庄分层次逐级提升的路径。^⑦人是田野政治学的核心关切。基于传统小农在后集体化时代自觉融入社会化分工体系的田野调查，田野政治学首次提出了“社会化小农”^⑧的概念，构建了解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田野政治学先后提出“农民理性扩张”^⑨“韧性小农”^⑩等概念，将具体的人带入国家研究，实现了从“韧性小农”到“韧性国家”^⑪的概念拓展，与“威权韧性”展开对话。田野政治学基于广东清远宗族村庄中的人地关系调整的田野调查，提出了“祖赋人权”^⑫这一概念，试图解释和概括根据血缘关系确定人的身份、资格、地位、权利、责任的现象，以此和天赋人权展开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田野政治学提出“农民性”^⑬理论。农户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塑造农民性的重要基础。田野政治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将“一家一户”问题学理化，创建了“农户制”^⑭概念。“农户制”概括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性，实现了与西欧的庄园制、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非洲的部落制的学术对话。“农户制”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田野政治学

① 徐勇、漆程成：《在“殿堂”与“田野”之间——构建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②⑦ 徐勇：《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路径、特性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

③ 徐勇：《“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④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⑤ 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⑥ 李旻昊：《作为枢纽概念的“国家化”：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建构的核心》，《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⑧ 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⑨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⑩ 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⑪ 陈军亚：《农户小农：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学海》2021年第1期。

⑫ 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⑬ 参见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⑭ 徐勇：《中国农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将家户带入中国国家进程的研究，实现了田野与政治学的直接关联。“家户国家”^①这一概念将“家户”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②村庄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单位，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的基本单元。田野政治学的最初阶段便是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③张厚安基于乡村治理格局的研究，提出“乡政村治”^④这一标识型概念。基于国家视角，田野政治学提出“草根民主”^⑤这一重要概念。田野政治学将“关系权”^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从血缘地缘关系等维度解释政治现象，提出了“关系叠加”^⑦概念，并提出了“关系决定国家”^⑧的命题。田野政治学将历史带入国家研究，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国家演化^⑨，之后基于中国政治统一体长期延续的考察，提出了“长周期政治”^⑩的研究视角，以此与“线性史观”展开对话。

田野政治学是以推动田野政治实践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学。除了田野调查，田野实验也是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田野政治学的田野实验可追溯至1990年代。1997年3月，张厚安带领田野政治学派的学者赴湖北省黄梅县，开展了“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水月庵实验”。“水月庵实验”丰富了田野政治学关于民主选举背后的复杂变数的认知，深化了对于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机制的思考。^⑪为培育乡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2004年10月，田野政治学派在安徽省蒙城县岳东村开展了第二次村治实验。这场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蒙城实验”从村庄的公共性、公益组织的可持续性维度深化田野政治学关于改造乡村社会的认识。^⑫为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田野政治学派同南方农村报社在广东省蕉岭县开展了“南农实验”。“南农实验”丰富了田野政治学派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和实践逻辑的认识，为理解乡村社会内在需求与现代国家建构双向互动的民主提供了经验基础。^⑬田野政治学派不仅设计和开展了“黄梅实验”“蒙城实验”“南农实验”等村庄治理层面的实验，也对乡镇一级的实验进行了观察。2002年9月，田野政治学派对湖北省京山县杨集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班子“两推一选”的实验展开了观察。“杨集实验”为田野政治学派透视乡村政治的真实状态和运作机制提供了途径，深化了田野政治学关于乡村政治、基层民主发展路径的认知。^⑭此外，田野政治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对中国基层治理创新探索展开了深入观察，提炼出“云浮探索”^⑮“巴东创举”^⑯“清远改革”^⑰“共同缔造”^⑱等实践经验。

① 任路：《家户国家：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传统及其内在机制》，《东南学术》2019年第1期。

② 邓大才：《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家户功能及中国经验——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吴记峰：《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及其拓展路向研究》，《政党研究》2021年第3期。

④ 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政策》1996年第8期。

⑤ 徐勇：《草根民主的崛起：价值与限度》，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25—233页。

⑥ 徐勇：《“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⑦ 徐勇：《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⑧ 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6页。

⑨ 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⑩ 徐勇：《中国政治统一体长期延续的三重共同体基础——以长周期政治为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⑪ 徐勇：《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村村治实验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⑫ 汪志强、袁方成：《参与式发展：草根组织生长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路径选择——蒙城县岳东村实验观察》，《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1期。

⑬ 马华：《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⑭ 徐勇、贺雪峰：《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嵌入乡村社会的事件及侧重学术角度的解读》，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291页。

⑮ 参见邓大才、余纪国、任路等：《再领先一步：云浮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⑯ 参见徐勇：《巴东创举：技术牵引下政府的自我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⑰ 参见任路、李博阳、方帅等：《清远改革：以治理有效引领乡村振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⑱ 参见任路、冯晨晨等：《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云浮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二、数字空间与田野政治学的“田野”

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所趋。在既有研究版图中，数字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数目字、以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以及数据三种内涵。^①一般而言，学术界对于数字的讨论多集中于数字技术层面，即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数字通过将信息转化为比特，突破信息的实体载体，实现信息的数字化。^②数字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方式，还改变了人与外界的连接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社会变迁。^③数字技术与网络影响和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时空形态，人类也凭借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形塑出数字空间这一新型空间性存在。^④数字空间是独立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⑤，描述其现象的是包括“信息空间”“网络空间”和“虚拟空间”等在內的一系列概念丛。^⑥关于数字空间，学术界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形成了多元化的定义：数字空间是一种信息系统，是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构建的虚拟环境或信息体系^⑦；数字空间是社会空间生产的结果，在人和人、人和社会的交往实践中形成^⑧；数字空间是表达主体情感认同与互动的文化空间。^⑨当前，普遍采用的技术性视角对数字空间进行定义，在其看来数字空间是由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更多智能设备通过网络链接形成的虚拟空间。^⑩

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有区别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内在特征。其一，数字空间具有虚拟性，是一种区别于实体空间的虚拟空间。在存在形态上，数字空间具有虚拟性。数字空间由数据、代码、算法等构成，数字空间通过图像、声音、交互设计构建起虚拟的空间场景（如虚拟会场、游戏地图、元宇宙城市）。这种场景已摆脱实体空间的物理限制，不依赖地理位置即可生成与使用。在数字空间中，用户通过虚拟的“数字身份”与其他用户互动，这使得人们可以脱离物理限制，在其中构建全新的身份认同。^⑪此外，数字空间中的互动资源也具有虚拟性。数字空间中具备交换和价值属性的数字货币、礼物、积分、流量等都没有物理形态，并且构成数字空间的数字符号与信息流通过界面实现可视化呈现。其二，数字空间具有超越性。“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成果，消弭了时间线性与空间有限性对人类宿命的约束，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维度和感官维度，进而使得人类社会的时空场域面临着数智化的形态再造与结构重组。”^⑫数字技术减少了信息传播时间，实现了信息数据的毫秒传播，使得数字空间在同一时间内兼容和呈现多个信息事件，同时数字空间也使得多人在数字环境中“同时在场”并展开跨地即时对话。数字空间不仅实现了时空的压缩，也实现了时空的延展。数字空间通过信息存储与再现，使事件跨越原有发生时间，长期存在并可被反复调用，实现持续在场。此外，数字技术通过生成新的虚拟环境，使人类活动范围超出物理空间的限制。其三，数字空间具有流动性。进入数字社会，固定的结构已经失去了合理性，社会空间从结构来看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⑬在流动性的影响之下，地域对人的约束关系已大大降低，“约束关系已由地域性的社会结构转变成富有流动性、实用目的而无地域限制的事务了”^⑭。数字空间中的个体数字身份也不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和平台间实现灵活转换。这造成个体之间的身份和关系可以随时生成、变更和消失，社交网络的结构也可

① 刘雨婷：《社会学视域下的五种数字观》，《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

②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5页。

③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④⑧ 刘亚品：《数字空间：互联网社会的现实建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10期。

⑤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等：《“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期。

⑥ 包冬梅：《开放数字环境下的个性化科研信息空间研究学术图书馆的视角》，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⑦ 孙全胜：《数字空间意识形态的三重风险及应对策略》，《社会科学家》2025年第1期。

⑨ 李多、彭兰：《2019年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八大议题》，《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1期。

⑩ 米加宁、彭康珺、孙源：《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治理研究》2023年第1期。

⑪ 王天夫：《数字社会研究的基本议题》，《光明日报》2025年4月11日。

⑫ 任兵、陈志霞、胡小梅：《时空再造与价值重构：面向未来数智治理的元宇宙》，《电子政务》2022年第7期。

⑬ 王锋：《从物理空间到流动空间：数字社会的空间流变及国家的治理效能》，《浙江学刊》2023年第6期。

⑭ 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79页。

以不断变化。其四，数字空间具有广泛性。“在现有互联网连通技术的基础上，5G 技术建构的是个人、事物、组织高度互联的社会。”^① 在此意义上，数字空间突破了地域限制，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地域和人群。此外，数字空间涉及的内容包括涵盖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虚拟现实等多种形式，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文化等多个层面。在此意义上，数字空间是泛在的，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② 质言之，数字空间具备覆盖面广、参与面广、应用领域广的特征，是一个兼容多层次、多维度的集合体。其五，数字空间具有可计算化的特性。数字空间中的信息可被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实现信息的数字化。“信息的数字化意味着信息的内容能够被用作计算程序的数据，进入计算过程中。”^③ 此外，数字空间也是一个可计算系统。数字空间的构成元素（信息、行为、规则）也可以用算法语言形式化表达，计算机也可对虚拟环境中的数据库、知识图谱、向量空间等进行计算和推理。

随着数字乡村工程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共享、算法优化与平台赋能等方式重构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④ 在数字赋能乡村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的变革过程中，乡村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治理规则与社会秩序，乡村数字空间应运而生。可将乡村数字空间视为在乡村地域范围内，以互联网及其技术平台为依托，在虚拟环境中构建的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与共享性的社会交往与治理场域。从此定义来看，乡村数字空间具备三重属性，数字是技术属性，即基于信息技术的交互平台；空间性是物质属性，即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公共性是社会属性，即包含公共权威、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的场所。乡村数字空间通过数字化的交互机制，将分散化的村民群体、村级组织与外部主体连接起来，实现信息生产、传播与存储的功能，并以此推进公共议题的讨论、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资源的流动与共同体的认同塑造等活动。在此意义上，乡村范围内的政务与治理平台、公共社交平台、公共性商业平台（短视频平台、社区直播间等）均可视为乡村数字空间，而非公共事务导向的交流空间（仅限个人或家庭内部的聊天群、私信、朋友圈）、不涉及公共事务功能的纯商业交易平台、完全封闭的内部管理系统等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乡村数字空间。

乡村是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乡村数字空间的产生对田野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其一，乡村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态，构成国家治理新的社会基础。随着乡村日益原子化、个体化和市场化，乡村空间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减少、资源匮乏、主体缺失、认同式微等困境。^⑤ 数字化缝合断裂的乡村社会，为村庄公共议题、公共舆论、公共活动等的存续提供平台，建构一个以熟人社会为镜像的数字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多元化的群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数字技术实现了多元群体跨地域、跨身份、跨圈层的连接。在此背景下，“社会正在从一个个局部性的、边界明晰的离散聚集转变为高度互联的庞大网络”^⑥。这种网络已突破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的连接方式，国家治理可以在一个更广阔、实时更新的乡村社会结构中展开。乡村数字空间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也是公共议题讨论和社会情感生成的场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社会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生成空间。其二，乡村数字公共空间的产生意味着国家和社会链接媒介的转型，即一种新的治理界面的生成。乡村公共空间既是村民交流、协商、互助的场所，也是国家权力、制度进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构成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治理界面，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⑦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的“接点”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关系扁平化的特征，“接点”空间呈现出嵌入与脱域共同叠加的特征，“接点”资源呈现出数字智能资源的供给以及社会资本的激活。^⑧ 随着治理界面的转型，既有面对面传递的政令、信息、服务已转化为数字化内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也在数字平台上完成，数字公共空间已构成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可视化入口”，同时也构成乡村公共治理的界面。其三，

① 邱泽奇：《连通性：5G 时代的社会变迁》，《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9 期。

② 王锋：《数字社会的空间构成及其治理重构》，《浙江学刊》2025 年第 3 期。

③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与研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 年第 1 期。

④ 应小丽：《共富型数字治理：数字乡村治理的逻辑建构与实践进路》，《中州学刊》2025 年第 7 期。

⑤⑦ 徐晓鹏：《接点治理：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机制与实践路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4 期。

⑥ 乔天宇、邱泽奇：《复杂性研究与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机会》，《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⑧ 康儿丽、谭丰隆：《“接点再造”：数字化转型重塑乡村治理的发生机制——基于 S 市 D 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实证考察》，《理论月刊》2025 年第 5 期。

乡村数字公共空间作为承载数字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新型平台，推动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国家的信息收集能力，也提高了国家将收集到的信息转化为治理能力。依据乡村数字公共空间中的人口信息、资源分布、舆情动态等数据，国家可实现差异化政策供给和资源配置，构建一种精准、动态的治理方式。此外，乡村数字公共空间实现了国家的政策、服务、信息直达村民个体，构建起一种扁平化的治理方式。此外，数字技术实现了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同一数字公共空间中互动，这打破单向治理格局，构建起网络化的治理方式。

三、建构适配数字空间的田野政治学

进入数字时代，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with 经典议题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以往，田野政治学以实地观察为核心，关注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的具体场域，而数字化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界限，将线上数字空间纳入新的田野范畴。这不仅促使田野研究方法向多平台、多数据类型的融合发展，也带来了对数字权力、数字民主与数字治理等新议题的关注。因此，数字公共空间既丰富了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也推动了田野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数字时代的转型，促进了田野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深刻回应和理论创新。

（一）迭代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田野政治学的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①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田野政治学研究方法迎来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实地访谈、观察到数字民族志、网络爬虫、计算文本分析与社交网络分析，田野政治学研究方法在深度与广度上实现了突破。

其一是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首先，网络民族志突破了传统田野调研的空间限制，为开展多地点、多线索、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田野研究提供了可能。^② 研究者通过实时、持续地观察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政治互动与话语表达，观察基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互动与话语交流，从而捕捉基层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和微观细节。这种方法极大提升了研究的现场感和真实性，使得研究能够反映出基层政治的真实面貌。其次，网络民族志通过从微观处切入，进入“乡村数字生活世界”，深入基层政治生活，揭示了基层政治在数字化条件下的新形态与新变化，真正实现理论与经验的交汇，回应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命题。此外，研究者通过收集网络资料，在微信、短视频、政务平台等数字场域中进行参与观察、互动记录和话语分析，描摹数字化政治行为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乡村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政治实践与权力关系，并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结构与权力逻辑。这一研究方法极大提升了基层政治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证力度，推动了田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

其二是虚拟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虚拟田野调查作为田野研究方法的一种重要演进形式，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兴起。该方法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平台，开展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在线问卷发放、焦点小组讨论以及政策反馈记录等形式的调查活动，从而实现对基层社会政治行为与互动机制的持续观察与深入理解。虚拟田野调查拓展了田野的空间边界，使研究者能够跨越地理限制，进入传统田野难以触及的场域，如跨省村庄、边远地区，或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场景。虚拟田野调查具有即时、高效、可追溯的优势，便于进行周期性跟踪研究，尤其适合观察数字治理项目的演变过程，以及政策回应与情绪表达之间的互动逻辑。研究者还可借助平台自动记录和信息归档功能，对政策公告、留言评论、反馈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或情绪识别，从而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资料获取。虚拟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研究替代手段，也是一种方法论革新。虚拟田野调查将传统田野中的亲身经历要求转化为对数字空间中意义建构的深入理解。虚拟田野调查不仅扩展了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对数字时代基层政治生活的认知，为田野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其三是田野实验研究方法的引入。田野实验对于田野政治学理论自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

① 徐勇、漆程成：《在“殿堂”与“田野”之间——构建中国特色的田野政治学》，《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② 孙信茹、段虹：《迈向“关系”的媒介人类学——基于田野的本土性实践与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实验，田野政治学很难走向历史深处，走向社会根基，也就很难有之后的田野政治学自觉了。”^① 社交媒体、在线社区和政务应用等数字平台构成了高度动态且具备丰富交互性的数字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承载了大量的政治信息流动与社会互动，更成为基层治理、公众参与和舆论形成的重要场域。研究者将实验设计引入数字平台，设计并实施系统性的干预措施，开展随机分配和对照实验，以实证检验政治行为、社会互动及治理机制的因果关系，从而确保因果推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此外，依托数字公共空间展开的田野实验突破了传统现场实验的地理限制，实现了大规模、多样化的样本覆盖，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数字田野实验不仅拓展了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场域，也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

（二）深化田野政治学的经典议题

田野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农民性、家户制等一大批理论概念，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个体的政治行为及互动模式，也催生了新的权力运作形态。这不仅使得权力的分布更加复杂且动态，也导致政治参与呈现多样化与即时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田野政治学的经典议题亟需在数字化语境中重新定义，以实现对其政治现象更深刻的理解与更有效的解释。

其一是关于个体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基于数字赋能，农民的政治行为呈现出显著的转型趋势，表现为参与渠道的拓展、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动员模式的去中介化以及权力认知与政治身份的重塑。在此背景下，“农民理性扩张”“农民性”“社会化小农”与“小农韧性”等理论概念得以重构与延展。在数字平台与技术工具的介入下，农民获取政策、市场与风险信息的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超越经验主义的“数字理性”，体现了农民理性扩张的结构性转变。同时，数字空间中的表达、互动与展示逻辑重塑了传统“农民性”，使其在媒介中呈现出更强的表演性与话语能动性。数字化还强化了小农与社会的网络嵌入，通过短视频、电商、社交平台等手段，提升了其市场连接能力与公共参与程度，推动了“社会化小农”向更具协商能力和制度整合度的方向发展。面对政策波动与外部风险，小农依托数字平台增强了信息获取、组织互助与资源调配能力，构建出更为灵活的“数字韧性”。

其二是关于家户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数字公共空间通过打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信息通道、重组家庭与行政之间的互动结构、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于现代家户制这一经典议题的再造。“家”是内向性的，承载着亲属关系、情感维系与代际传承等社会功能；“户”是外向性的，代表国家对人口的认定与管理单位。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使“家”的情感与社会属性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延续甚至扩展，同时使得“家”的内向性功能外溢为可计算、可监测的社会数据，强化了家作为私人生活单位的可视化与数据化管理；另一方面，国家凭借数字系统，“户”的数字编码不仅识别地址和人口信息，也内嵌了“家庭关系”“住房性质”“社会风险等级”等多维标签，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能力。数字对于家户制的重构实现了国家向微观社会单元的深入，家户制也呈现出从物理实体向数据画像的治理过渡。

其三是关于村庄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数字公共空间的兴起，推动了乡村治理的信息结构与权威结构的深刻转型，进而孕育出以数据与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治理形态。首先，信息的生产与流通由原先依赖宗族、人情与基层政权的封闭式路径，转向开放性、可视化与平台化的传播逻辑，信息获取不再受制于权威中介，而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这种信息结构的转型削弱了传统权威对信息的垄断，进而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权威基础，使治理权威不再仅源于组织地位或经验威望，而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数据支持与舆论响应。其次，在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结构更加多元分散，行政力量、市场主体与村民个体在数字空间中并存互动，形成一个跨主体、跨层级的协同网络。此外，数字平台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治理基础从对熟人社会关系的依赖，转向对数据指标与算法模型的依赖。因此，数字公共空间不仅改变了乡村治理的“话语结构”，更深刻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制度结构”，构建起数字赋能的乡村治理新形态。

其四是关于国家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数字公共空间通过构建新的互动场域与方式，重塑了国家与基层

^① 徐勇、任路：《以现场实验为引导的田野政治学建构——基于华中师范大学四次政治实验的回顾与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开辟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数字场域，形成了以数字技术和信息流为核心的虚拟治理空间。这一空间的构建使得国家权力的延伸不再依赖于物理载体或传统组织网络，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实时感知与动态介入，重塑了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改变了传统的单向权威传递模式，强化了信息的双向流动和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方式。国家凭借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使得政府能够精准捕捉基层社会的需求和舆情动态，快速回应公众关切，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基层社会在数字公共空间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机会，普通民众能够在公共空间中直接发表意见、监督公共事务。这种参与突破了地理位置、身份背景和行政等级的限制，极大拓宽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维度。

（三）捕捉田野政治学的新兴议题

田野政治学要求以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为基础，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①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空间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政治权力的生产、分配与行使过程，这不仅催生了新的政治现象，也促使田野政治学对这些现象进行概念化，创造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政治学概念与议题。

其一是关于农民个体数字参与行为议题的兴起。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公共空间的拓展，农民不再只是以村落为界、面对面协商与治理的行动者，而是逐步成长为具有数字素养、能够跨越地理边界进行表达与互动的现代政治主体。通过政务平台、微信群、村务公开系统等，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与监督，推动协商民主向数字化延伸，形成了数字协商的新型协商形态。面对权利受损，农民借助短视频、自媒体等手段发起数字抗争，实现低成本、高扩散的舆论表达，开展数字维权、数字抗争。借助数字平台，农民也能自发进行数字动员，组织集体行动，打破传统动员结构的层级依赖。通过在线投票、问卷反馈等形式，农民亦可通过数字参与的方式进入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过程。此外，数字空间形塑了农民的数字话语权。数字话语权是技术赋权、社会表达与政治博弈的复合产物。农民个体借助数字平台，在公共空间中表达自身经验、利益诉求与政治主张，并通过网络舆论转化为实体行动。总体而言，基于数字赋能，农民产生了数字协商、数字抗争、数字参与、数字动员与数字话语权等多样化行为。这不仅标志着农民从“被治理者”转向“数字治理共同体”中的一员，也推动田野政治学对农民个体政治行为进行理论上的再认识。

其二是关于乡村数字治理议题的兴起。首先，数字权力的兴起改变了乡村权力的运行方式。在以往的乡村治理中，权力的行使往往依附于“面子—人情—宗族”关系网络，依赖村干部的经验威望和村庄中的熟人控制结构。政务 App、村务公开平台、数字监督系统等数字手段的引入实现了治理过程的数据化、程序化与可视化，使得治理权力逐渐脱离传统关系结构而嵌入到平台逻辑与技术流程之中。同时，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技术中介”或“平台操作员”逐渐掌握了“数据控制权”这一新型权力，成为新型治理权力格局中的关键主体。“数据控制权”的兴起，表明乡村权力运行的重心正从“关系网络”向“技术网络”转移。以往依靠人情、威望与组织等级维系的治理体系逐渐让位于对数字平台及算法逻辑。这种转型既可能带来治理效率与透明度的提升，也可能引发了政治不平等与治理挑战。其次，数字化转型也塑造了“微信治村”这一微观实践形态。微信群所构建的“半公开—半熟人”的场域，既保留了熟人社会的社会信任，又引入了数字工具的高效连通性，构成了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治理空间。微信治村带来了高效、便利、低成本等优势，同时也造成了数字伦理、数字形式主义以及非正式治理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等问题。

其三是关于国家与社会数字互动议题的兴起。数字技术的介入深刻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过程，衍生出一系列新兴概念，丰富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视角。首先，国家通过数字身份认证、行为追踪、数据挖掘等手段，构建起一种隐形且高效的规训机制。这种数字规训凭借算法推荐、舆论引导等软性方式在微观层面塑造公民的行为模式和合规意识。其次，国家凭借数字公共空间，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社区、网络舆论场和私人领域，实现对社会资源与信息流动的高度掌控，同时将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各领域和日常生活。再次，国家通过建设数字政务平台、智能服务终端和移动应用，实现基层政务服务的线上办

^① 陈军亚：《从感觉到自觉：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以“韧性小农”概念建构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村民能够便捷获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等多项公共服务。数字公共服务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精准化、便捷化与互动化，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的“柔性渗透路径”^①。最后，国家通过网络传播的国家叙事、数字化的民族文化推广、线上公共事件的正面引导，实现国家认同的生产和巩固，进而建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四、结语

田野政治学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场域，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田野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始终沿着‘中国性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展开，并走向深入。”^② 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田野的边界，赋予了研究者新的观察视角与方法工具。在数字时代，田野政治学不仅面临着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转型，也迎来了概念发展与范式重构的契机。文章从网络民族志、田野实验等维度入手，对田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数字化转型展开分析；从农民性、农户制、乡村政治等基础概念入手，对田野政治学经典概念的再造展开考察；从数字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新兴经验事实入手，对田野政治学新兴议题的发展展开分析，以期拓展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体系、研究议题与研究范式，找寻数字时代田野政治学的理论进路。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是一项未了的接力过程。数字技术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塑、政治权力的再配置以及公共空间的重构，为田野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域与实践场。在此背景下，田野政治学亟须在继承已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回应数字时代提出的现实挑战与理论召唤，推动学科知识体系的持续生长与研究范式的动态演进，以此增强本土政治学研究的解释力，构建根植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目标导向下的县城功能更新研究”(25NDJC008YB)的阶段性成果。刘骁为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王胜强)

Expansion of Field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pace

WANG Chengyu, LIU Xiao

Abstract: Based on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villages, field politics has made many beneficial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knowledge in China. Digital space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 governance interface, and governance metho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ecoming a new field for field politics. The iteration of field domains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and raised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opics in field politics. Specifically, field politics can introduc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etwork ethnography and digital field experiments to adapt its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empirical changes in digital space, it can reconstruct classic concepts such as peasant nature and household system; and by capturing emerging phenomena in digital space, it can update the research topics of field politics.

Key words: field politic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digital space, rural governance

① 张启春、王健：《柔性渗透：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服务路径》，《江汉论坛》2024年第7期。

② 徐勇：《从田野政治学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